

论晚清“以商立国”思想

何梦琳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重庆 北碚 400715)

摘要:“以商立国”思想形成于19世纪末,是由以郑观应为代表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救亡图存的方案。其主要内容是以商业为中心,发展经济。该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以商立国;郑观应;救亡方案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66(2011)04-0086-04

鸦片战争以后,随中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逐步解体,一些新的经济思想也开始冲破传统思想的樊篱,影响着中国社会。在19世纪70-80年代,涌现了振兴商务,“以商立国”跟外国进行商战的思潮。“以商立国”思想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认识的发展结果,也是对到郑观应为止的中国有识之士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思想总结。该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研究“以商立国”思想,可以了解那个时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走向和与时变化的脉络,进而加深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但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于“以商立国”思想还没有系统的论述。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以商立国”思想的形成、主要内容及评价等方面,进行初步的考察与分析。

一、“以商立国”思想的成因探析

“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1]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引起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急剧变化,给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极大的震撼,激起了他们深入的思考,使他们从“天朝大国”的幻梦中逐渐清醒过来,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的道路,提出了种种救亡图存的方案,这些方案随着时势的变化也在不断地深化。

中国封建社会的封闭与落后,造成了中国与外

国文化的隔绝,使中国对西方世界的了解甚少,认识模糊。由于鸦片战争外在表现是一种军事力量的较量,使得从来是朦胧的“泰西”,首先给中国人的印象,就是泰西的坚船与利炮。中国与西方军事技术之间巨大的落差,使两千多年来传统的夷狄观念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头脑中开始动摇。但由于当时同西方国家的正面接触才刚刚开始,对西方的情况了解不多,所以他们更多的是只从“器”的方面观察到了西方的长处,认为“内地船炮非外夷之敌”^[2]。为了能够“制敌”,林则徐主张中国自己“制炮造船”,且要“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2]。他为此组织编译了《华事夷言》、《四洲志》等书,探求西方的新知识。

后来,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写出了《海国图志》,并系统地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与林则徐一样,他也认为“船坚炮利”是西方战胜中国的主要原因,因而师夷之处主要为西方的军事技术。然而,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魏源不仅与林则徐一样重视坚船利炮,而且同时强调了重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认为英法等国在军事上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们提倡注重发展工商业,“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3]这体现了魏源普遍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主张,应该被看成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以商立国”论的滥觞。

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口号,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思想指导,兴办了一些近代军事与民用

收稿日期:2010-11-08

作者简介:何梦琳(1987-),女,四川西昌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9级研究生。

工业。其中曾国藩在早期洋务运动中,就形成了“至秦用商鞅以耕战二字为国……今之西洋以商战二字为国”^[1472]的认识。张之洞也多次指出:“今日中国救贫之计,惟有振兴农工商实业。”^[1515743]他们的这些观点,反映出了洋务官僚重商的思想。但由于其指导思想的偏差与自身存在的矛盾,使其“商政”未能充分发挥功效。但他们的思想丰富了“以商立国”的内涵。

随着外国商品的不断涌入,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城乡手工业,瓦解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给中国的对外贸易造成了越来越大的逆差,引起“漏卮无极,以万以亿”^[161668]的白银外流,对中国的社会经济、货币流通和清政府的财政状况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严峻的形势,迫使一些先进之士更加深入地研究西方富强之道与中国贫弱之因。

19世纪70年代后,中国已产生了民族资本和以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胡礼垣等为代表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由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主要的方式还是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通过“通商”对中国大量销售商品和攫取原材料,并以此来掠夺中国的财富。他们深切感受到中国商业资本主义受列强压抑造成的严重恶果,认识到了学习西方不在于船坚炮利等器物方面,而在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国的工商业,并建立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因而,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广泛学习西方,改革经济、文化、军事以至政治,以促使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摆脱严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他们的思想偏重于流通领域来致富,并从贸易方面抵制资本主义经济的侵略。在经济方面,首先提出振兴商务、“以商立国”的主张。

“以商立国”的正式提出经历了一个过程。最先源于西方经济知识的传播者王韬。他认为,在清王朝的统治下,由于受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从上到下形成了“崇本抑末”的思想观念。“重农而轻商”、“贵谷而贱金”、“农为本富而商为末富”^[1745](卷二,《兴利》)的传统思想,极大地妨碍了中国工业和商业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的社会经济长期停留在一个低水平的技术落后的状态上。他在19世纪70年代旅英之后提出了“商富即国富”^[17299](卷十,《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须“恃商为国本”^[17300](同上)的观念,认为西方国家之富强,就是靠的发展商业。薛福成认为:“大抵外洋各国莫不以商务为富强之本”^[181112](卷一,《通筹南洋各岛添设领事官保护华民疏》)而且,他强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强是因为“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181254](卷三,《英吉利利用商务闢荒地》),并说:“是握四民之纲者,商

也。”^[181254](同上)可见,他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商业发展可以大大带动工业、农业的发展,也能推动文化技艺的发展。马建忠于1890年写的《富民说》,在讨论国家富强的论题时,指出:“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19111](《富民说》)改良思想家何启、胡礼垣也认为:“夫利济天下,惠及群生者商也”^[101384](卷五,《新政论议》(中)),“今之国若有十万之豪商,则胜于有百万之劲卒”^[110460](卷六,《新政论议》(下))。如上所述,王韬、马建忠、薛福成、何启、胡礼垣等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重商、振兴商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但真正的集大成者是郑观应。他在王韬、马建忠、薛福成等早期改良派知识分子的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提出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以商立国”、进行商战的主张。这对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且具代表性。

二、“以商立国”思想的主要内容

“以商立国”思想的核心为振兴商务,它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所特有的一个范畴,其实质是要求发展中国自身的资本主义经济,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并最终实现富国强兵,驱逐外国侵略者的目标,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提倡以商为本

郑观应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归纳为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两种方式,并把这两种方式进行区分和比较,认为经济侵略比军事侵略更加严重,更加危险。因为他认为经济侵略是西方列强征服并奴役殖民的最根本的手段。他指出:“各国并兼,各图利己,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疆拓土,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皆商人为之先导。”^[111614](《盛世危言·商务三》)并认为军事侵略归根到底是围绕着经济侵略进行的,西方列强以军事侵略为手段,以此来实现其经济侵略的目的,保卫其经济利益,即“以商富国,以兵卫商”。^[111595](《盛世危言·商战下》)而且,经济侵略相对于军事侵略而言,会给被侵略者带来更大的危险。

郑观应把西方资本主义在军事上的侵略、中国的反侵略都叫作“兵战”,而把西方经济方面的侵略与中国的反侵略称为“商战”。指出:“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培克敝国无形。”^[111586](《盛世危言·商战上》)主张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这两种侵略方式,采取“兵战”来抵御列强的军事侵略,用“商战”来抵御列强的经济侵略,并且把商战置于首要地位,强调“习兵战不如习商战”。^[111586](同上)并指出:“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111595](《盛世危言·

商战下》)

要进行“商战”就必须“以商立国”,要“以商立国”就必须振兴商业。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把振兴商务、“以商立国”,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作为进行“商战”的基础与备战的储蓄,而且他们把振兴商业看作是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进步的动力。做到“人尽其材”、“地尽其力”和“物畅其流”。陈炽认为:“商务盛衰之枢,即邦国兴亡之券也。”^{[112]366}郑观应针对“以农立国”的说法,明确提出了要以振兴商业为中心,要“以商立国”。认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舒畅其血脉也”^{[11]604}(《盛世危言·商务一》);“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11]607}(《盛世危言·商务二》)这种以商业发展为中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大力发展商业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思想,就是“以商立国”的核心。郑观应强调振兴商务,实施“以商立国”,同西方列强进行“商战”,把发展国内商业生产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的问题直接联系起来,并把此作为事关被侵略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提了出来,具有重大意义。

(二)重视发展廉价高效的机器生产,以增强本国商品的竞争力

早期改良派认为要实现“以商立国”,取得“商战”的胜利,就必须建立与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薛福成根据自己在欧洲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的观察指出:“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特工为体,特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8]1332}(卷三《振百工说》)并强调大机器生产的作用,提出机器殖财养民说,要求发展大机器工业。郑观应则观察到相对于泰西而言,中国却“苦于无机器,以致窳劣不精,难于销售。由是而论,通商之利宜其独让西人也”^{[11]718}(《盛世危言·纺织》)。这势必造成“徒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已”^{[11]588}(《盛世危言·商战上》)的局面,变成外国列强掠夺的对象而已。所以,他指出:“只有生产出同洋货相竞争的各种物美价廉的商品,做到中国所需于外洋者皆能自制,外国所需于中国皆可运售,这样才能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郑观应还提出了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机器制造业。他强调:“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11]626}(《盛世危言·商务五》)认为要使“中国之利自不至外溢”,应该“设专厂制造机器”^{[11]627}(同上)。这样,就能使“各种机器自能制造,则各种货物亦自能制造”^{[11]627}(同上),商品生产亦工省而价廉,这比薛福成只主张建立和发展新式工业,则要前进

了许多。可见郑观应已认识到中国仅仅只靠购买机器来发展商务的做法,仍无法使独立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发展,摆脱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从而他主张自己制造各种机器,以促进本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他的这种主张有利于增强与洋货的竞争能力,使利权不致外漏,进而决胜于“商战”。在有了先进机器的同时,也要有相应的人才来操作,因而,薛福成认为要改变旧有的教育科举制度,鼓励人们学习科学,精研工艺。

为了发展本民族的装备工业和进行机器生产急需人才,郑观应进一步指出:“广设学堂,各专一艺,精益求精,仿宋之司马光求设十科考士之法,以示鼓励”^{[11]595-596}(《盛世危言·商战下》),重视培养各种专业技术人才。

(三)实行励商之法

在19世纪70-80时代,中国已经失去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等特权,严重阻碍了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发展,并保证同外国资本主义进行“商战”取胜,他们主张政府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励商之法”,革除“困商之政”。

为了减少对外贸易出现的逆差和增加顺差,马建忠主张实行贸易保护的政策,学习西方“重征进口货而轻征出口货”^{[9]17}。在加强商战的实力方面,薛福成要求清政府实行恤商、励商的政策,指出:“西洋‘平时谋国精神,专在藏富于商……盖其绸繆商政,所以体恤而扶植之者,无微不至。’”^{[8]1287}(卷三《西洋诸国为民理财说》)并且强调在国内发展近代机器工业,振兴商务,实行奖励“振百工”的政策,认为:“泰西百工之开物成务,所以可富可强可大可久者,以朝野上下敬之慕之扶之翼之,有以激励之之故也……中国果欲发愤自强,则振百工以前民用其要端矣。”^{[8]1334}(卷三《振百工说》)

由于清廷对民办近代工商业进行压制,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抨击清政府对商民“时且遏抑剥损之”,致使“上下交失其利”^{[13]284}(《带上苏抚李官保书》)。郑观应指出:“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虽欲商务之兴,安可得哉?”^{[11]609}(《盛世危言·商务二》)提出了保商之法,即清政府给商业上以行政上的扶植,以使中小企业不至于被外商兼并而破产。最初,他们对洋务派官僚还抱有极大的幻想,曾把官督商办描绘成最合理的企业形式。随官督商办这一企业形式弊端的日益暴

露,他们对洋务派越来越不满,针对洋务派官僚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官夺商权”、“专擅其事”、“调剂私人”和贪污中饱私囊等诸多弊端,进行强烈谴责,认为洋务派“袒媚洋商而摧折华商”^{[14]83}(《创立商部说》)且多“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华商因此不及人,为丛驱爵成怨府”^{[15]1370}(《商务叹·罗浮倚鹤山人诗草》)为此,郑观应提出了办新式企业应以“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11]612}(《盛世危言·商务二》)为原则,呼吁在全国推行“励商之法”。

(四)设商部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希望通过提高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从保障他们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使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大力提倡设立商部。陈炽认识到:“泰西各国皆设商部,另有商律,专主护商。”^{[14]84}他建议清政府设商部,定商律。并强调:“商之于国也,国之于商也,固已共戚同休,迥非昔比矣。不立商部,何以保商?不定商律,何以护商?”^{[14]84}郑观应也提倡“仿造西例办法,必于六部之外,特设一商部,兼辖南、北洋通商事宜”^{[11]616}(《盛世危言·商务三》),并在各省设立商务总局与分局,再分别由熟悉商务和公举的商人代表来主持其事,“一切商情准其面商,当道随时保护”^{[11]606}(《盛世危言·商务一》),郑观应认为通过设立商部可以使“胥吏无阻挠之弊,官宦无侵夺之权,厘剔弊端,百废可举”。^{[11]606}(同上)这样便能提高和发挥商人对于“商战”的积极性,实现“以商立国”。这一提议初步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要求,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滋长的民权思想。

三、结语

自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开始走向近代化。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下,一些有识之士主张学习西方,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他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求强求富的主张与实践并没有消除当时严重的民族危机。随着外来商品的不断输入,经济侵略的不断加深,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危机,造成了本国工商业发展的迟滞。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以郑观应为代表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从“商握四民之纲领”的认识出发,吸取西方国家发展工商业的经验,提出振兴商业、“以商立国”,发展本国商品经济与外国资本主义进行“商战”。他们针对清政府压制民族工商业的“病商”、“困商”之政,提出了“保商”、“励商”以及提高“商民”政治地位,在国内创造一个让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自由发展的环境的要求。并

对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经济命脉,阻碍中国工商业发展的诸多行径进行抨击,提出“修约”主张,要求废除西方列强在华获取的一系列特权,进行平等的“商战”。反映了当时中国新生民族资本发展的要求。他们的这些观点和主张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有利于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因而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并且这一方案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开启了中国近代实业救国的先河。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这些宣传呼吁,促使改革中国的要求逐渐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思潮。这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做了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

但由于“以商立国”的主张本身存在着相当的缺陷,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使得他们对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政治前提认识还不够,只注重经济发展的形式。他们提出的改革主张更多的是针对一些具体的问题,而忽略了体制的变革,故未取得较大的成效。而且他们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主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夹缝中也缺乏实施的环境和条件,使之不能有效地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抵制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

“以商立国”思想的实践表明:不彻底推翻腐朽的封建制度、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不具备民族独立和经济自主的基础上,企图以改良的方式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得到发展,进而走向富强之路的方案是行不通的。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M]//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48年1月-1949年9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2]林则徐. 密陈夷务不能歌手片[M]//两广奏稿卷四. 林文忠公政书. 北京:中国书店,1991.
- [3]陈旭麓. 近代中国八十年[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 [4]曾国藩. 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七[M]//曾文正公全集. 上海:东方书局,1935.
- [5]王树枏. 书札六[M]//张文襄公(之洞)全集·卷二百一十九. 台湾:文海出版社,1987.
- [6]赵靖. 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7]王韬. 韬园文录外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8]薛福成. 庸庵文集(第三册)[M]. 台湾:文海出版社,1987.
- [9]马建忠. 适可斋记言记行·卷一[M]. 台湾:文海出版社,1987.
- [10]胡礼垣. 胡翼南先生全集[M]. 台湾:文海出版社,1987.
- [11]夏东元. 郑观应集(上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12]侯厚吉,吴其敬.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第二册)[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 [13]王韬. 弢园尺牋·卷七[M]. 台湾:文海出版社,1987.
- [14]赵靖. 易梦虹.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中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5]夏东元. 郑观应集(下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